

林纾小说翻译过程中的伦理选择与译者伦理身份

Lin Shu's Ethical Selection and Ethical Identity in His Translating of Western Novels

陈 勇 (Chen Yong)

内容摘要：本文考察林纾面对西方小说中的伦理事实与晚清社会伦理秩序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所做的伦理选择，并探讨其背后的译者伦理身份。研究发现，林纾采用了保留、替换、改写、删除和增添五种伦理选择形式，对西方伦理事实既有保留也有删改。这是由于林纾“中体西用”的伦理身份使然，即他主要是传统伦理捍卫者同时也是维新派，这种身份使得林译小说既改写了原文的伦理结构和人物的斯芬克斯因子，也呼应和建构了目的语社会的伦理禁忌和伦理秩序。同时，这种身份本身的悖论导致林纾伦理观的悖论性和林译小说伦理效果的悖论性。

关键词：林译小说；伦理选择；伦理身份；翻译；中体西用

作者简介：陈勇，文学博士，天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批评话语分析。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项目“译介学视阈下中央文献翻译的话语研究”【项目编号：TJWW17-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Title: Lin Shu's Ethical Selections and Ethical Identity in His Translating of Western Novels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Lin Shu's choice in the potential conflicts between the ethical events in Western novels he was translating and the ethical order in the target Chinese society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xplores his ethical identity which motivates his choices. It finds that he retains, replaces, rewrites, deletes and invents the ethical events in the source texts, resulting in both keeping and changing of Western ethics. This result is due to his identity derived from his belief "Western knowledge in service of Chinese culture," which indicates that he is primarily a defend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thics and secondarily a reformist. Consequently, his translation alters the ethical structure of and the characters' Sphinx factors in the source novels on the one hand, and echoes and constructs the ethical taboos and orders in the target society of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The paradox in his dual identity leads to the paradox both in his personal ethics and in the ethical effects of

the novels translated by him.

Key words: novels translated by Lin Shu; ethical selections; ethical identity; translation; Western knowledge in service of Chinese culture

Author: Chen Yong, Ph.D., is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Tiangong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mail: garychenyo@126.com).

晚清是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欧美独具一格的诗学、伦理、思维方式和政治观念等开始以文学作品为载体涌入中国，引发中西思想激烈碰撞。在文学所表征的各个社会生活领域中，伦理可能是碰撞最激烈的领域之一，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与西方的伦理在许多方面是迥异的，而且伦理本身涉及“正确”与“错误”的价值判断，一方认为是正确的伦理关系在另一方看来可能是错误的，反之亦然。这两套伦理系统在一些方面“针尖对麦芒”。小说可能是最能生动和充分体现伦理道德的文学体裁之一，因为它“非常详细地、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中各种角色的价值关系”（韦恩·布斯 3）。小说的翻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两套伦理系统发生冲突的过程，对其进行研究，可以窥见译者的伦理选择及其背后的伦理身份。本文借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相关理论和术语，以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以下简称“林译小说”）为研究语料（以《伽茵小传》和《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主，兼及其它小说），归纳翻译过程中伦理选择的类型，并将伦理选择放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下，结合林纾所写译序、跋和文章，探讨这些选择背后的译者“中体西用”伦理身份。

一、林纾的伦理选择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学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分析和解读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的伦理价值和文学的教诲功能（Chen Lizhen 404）。这一理论的创立者聂珍钊教授指出，伦理选择（ethical selection）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一个基本概念，它一方面是指人的道德选择，即通过选择，达到道德成熟和完美；另一方面是指对于两个或更多道德选项的选择，不同的选择结果具有不同的伦理价值（Ross 12）。人物通过伦理选择将自己的伦理意识转化成伦理行动（尚必武 26）。选择的主体可以是文学作品中的任何人，选择的对象是“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不同组合”（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 74）。本文的伦理选择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当原文中的伦理事实与目的语社会的伦理禁忌（或译者本人的伦理观）发生冲突时，译者作出的选择。选择的主体只能是文本跨语际转换过程中的译者，选择的对象是原文的伦理事实和目的语社会的伦理禁忌（或译者本人的伦理观）。伦理选择往往取决于伦理身份（ethical identity），不同身份的人可能会做出不同选择（Ma Xiaoli and Hao Xiangjian 504）。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

伦理身份泛指人的各种身份。由于身份是人的独有特征，其主体是人，因此人的身份就是伦理身份（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4）。本文的伦理身份是指译者的伦理身份，即译者的各种身份中，能影响其在原文的伦理事实和目的语社会的伦理禁忌（或译者本人的伦理观）之间做出取舍的身份。

林纾所译西方小说的原文中，各人物已经在当时的伦理环境（*ethical environment*）下做出了伦理选择，形成了伦理事实，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考虑到这些伦理事实可能会与目的语社会的伦理禁忌（*ethical taboos*）或伦理规范（*ethical norms*）发生激烈冲突（或者与译者自己的伦理观不一致），会在二者之间做出取舍，进行伦理选择。他的伦理选择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

（一）保留

林纾将原文中一些可能违背目的语社会伦理禁忌的伦理事实忠实地翻译出来，主要涉及孝道、女德、女权、宗教等方面。例如，伽茵和马克等女性大胆主动地追求爱情、伽茵未婚先孕有了私生女、洛克对伽茵表白时的“女尊男卑”等情节，虽然有别于甚至颠覆了中国传统的男方主动、女方被动的爱情模式和男尊女卑的性别关系，但在译文中都保留了下来。《伽茵小传》原著第25章中，伽茵知道自己怀孕后，难以入睡，思前顾后，焦虑万分：

原文：Moreover, as time went on, a new terror took her, that, vague in the beginning, grew week by week more definite and more dreadful. At first she could scarcely believe it, for somehow such a thing had never entered into her calculations; but soon she was forced to acknowledge it as a fact, an appalling, unalterable fact, which, as yet secret to herself, must shortly become patent to the whole world. The night that the truth came home to her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further doubt was perhaps the most terrible which she ever spent. For some hours she thought that she must go mad: she wept, she prayed, she called upon the name of her lover, who, although he was the author of her woe, in some mysterious fashion had now grown doubly dear to her, till at last sleep or insensibility brought her relief. But sleep passes with the darkness, and she awoke to find this new spectre standing by her bedside and to know that there it must always stand till the end came. (Haggard 265)

林译：且近日新有所触，为事至丑，前犹模糊，近乃日形其确，其事初止一身知之，思及后日，则必哄传不可掩讳。方第一日，自觉有身时，夜中焦灼，至不能贴席；思极而哭，或呼天自救，或屡呼亨利之名。明知亨利为己祸根，而思及恩意，则又热血如沸。既而酣睡，然睡即能酣，而祸根终无自脱之日。睡后尚有醒时，忧从中来，如何断绝？（哈葛德 240-41）

林译虽稍有改动，但将源文信息基本译出，并在译文中将伽茵焦虑的缘

由即“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unalterable fact)表达得更为明确和具体:“自觉有身”(即得知怀孕)。这一选择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译者对婚恋自由的认可,因为未婚先孕在封建时期的中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林纾选择将它如实译出。未婚先孕虽是“欲”的结果,却也是“情”的自然发展,情和孕都是双方的自由选择。

(二) 替换

林纾用儒家的伦理观念替换原文伦理观念,以此改造原文的伦理事实。例如,《伽茵小传》中,伽茵为了让亨利家族摆脱困境,忍痛放弃与亨利的感情,让他迎娶债主来文杰的女儿爱玛。来文杰为伽茵离开亨利而感到高兴,称赞伽茵是一个勇敢的女孩:…… he said: “but all the same you are a brave girl” (Haggard 201)。林译是:“来文杰闻言,肃然起敬曰:‘此语出之忠义之肠,老夫佩女郎盛德’”(哈葛德 162)。“勇敢”是指人敢于克服困难,大体上属于人对于事的伦理,“忠义”和“德”主要属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林译将“勇敢”译成“忠义”和“盛德”,是将人对于事的伦理替换成人與人之间的伦理。

(三) 改写

林纾用儒家伦理改写原文中的西方婚恋伦理、性别伦理和形象伦理等。例如,在《伽茵小传》中,爱伦(Ellen)在答应密而华德(Edward)的求婚时说“I will say yes, now and for always. I will be your wife.” (Haggard 69),林纾将这句话译为“我今许汝,永为君家人矣”(哈葛德 42),他把“wife”译为“君家人”。“君家人”一词体现了女性在父权制婚姻和家庭中的附庸地位,她们需遵守父系、父居和父治三条伦理:子女承父姓,家庭成员以父亲为参照中心来确定各自的称谓和身份;子女应生活在父亲所在的家族里,而不在母亲的家族里;父亲是一家之主,在家庭事务中具有决定权(潘红 412-13)。女性嫁入男方家庭后,就要服从于父权和夫权,沦为丈夫的附庸,成为“君家人”。原著中,爱伦宣称“I will be your wife”,是在平等、自主的婚姻伦理秩序内,以一个独立自主女性的身份承诺成为密而华德的配偶,可是在译文中被林纾纳入了“三从四德”的封建家庭伦理秩序中。

(四) 删除

林纾删除原文中违背儒家伦理的情节。例如,在《巴黎茶花女遗事》中,女主人公马克年幼时曾常遭母亲虐待,母亲死时,她的伤心程度不如后来自己的狗死时的伤心程度(Dumas 112),林纾删除了这个情节。林纾可能认为这有违孝道,即使母亲做法不对,子女也不应该不孝。

原著中对“欲”、性爱的描写在译文中也被删除或大幅缩减。例如,《巴黎茶花女遗事》原著描写了亚猛在和马克的性爱过程中的感受:

原文: Oh! How strange was the night that followed! The whole of Marguerite's life seemed to be concentrated in the kisses she lavished on me. I loved her so

intensely that, in the transports of my loving frenzy, I wondered whether I should not kill her so that she would never belong to anyone else.

A month of such loving, body and soul, would be enough to bury most people.

Day found us both awake. (Dumas 178-79)

林译：是夜情景甚冰冷，不可意测。（小仲马 71）

林纾删除了原著中恋人之间的激情画面，仅以“是夜情景甚冰冷，不可意测”一笔带过。

（五）增添

通过增添一些词语或句子来表达自己的伦理观，或增加原文中并不存在的伦理事实。

在《伽茵小传》中，亨利与伽茵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其父在临死前再三劝说他与家境殷实的爱玛结婚，但遭到亨利拒绝。在争执中，亨利坚定表达了要与伽茵结婚的愿望。

原文：There had been some quarrel between Henry and his dying father, and in that quarrel her name had been mentioned. Strange as it seemed, it might even be that he had declared an intention of marrying her. (Haggard 189)

林译：亨利情多，必违父训，父招不从，必诘其拒婚之由，叙我姓名，亦情理所有……。 （哈葛德 118）

在中国，对于父亲的临终遗言，无论赞同与否，子女往往都要认真听取甚至遵照执行，这是“孝”的具体表现。原文的叙述是中性的，只是说亨利与临终前的父亲发生了争吵，未对父子中的任何一方做评价，而林译却增加了“父训”和“父招”两个词对亨利做道德评判，暗批亨利违背父命，不守孝道。

总之，面对原文伦理事实与目的语伦理禁忌之间的冲突，林纾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替换、改写、删除和增添等手段对前者进行改造，将之纳入中国传统伦理系统，使之披上了儒家伦理的外衣，但同时也保留了部分与儒家伦理相冲突的伦理事实。是改是留，不是任意为之，而是由林纾的伦理身份决定的。

二、译者的“中体西用”伦理身份

在中西伦理冲突中，林纾既适当地保留了西方的一些伦理事实，为晚清时期的中国伦理秩序注入了新鲜因素，也改造了另一些伦理事实并将其纳入中国的传统伦理秩序。这使得他的译作广受欢迎的同时，仍遭到了保守派和改良派的双重攻击。保守派批评他破坏了伦理道德秩序，寅半生评价道：“林

氏之所谓《伽茵小传》者，传其淫也，传其贱也，传其无耻也……”（陈平原、夏晓虹 249）。而改良派则指责他思想太保守，梁启超（88）说：“有林纾者……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於新思想无与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更是对林译小说中的古文形式和守旧思想大加挞伐，钱玄同（1917）斥林纾为“桐城谬种”，批评林译小说“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可见，保守派批其不够保守，改良派也批其不够激进，“夹”在中间的林纾未能让任何一方完全满意。他的这个困境，只有放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下从他的伦理身份的角度才能得到合理解释。

晚清时期，内忧外患，一方面清政府腐败无能，民愤涌动，另一方面连遭列强欺辱，甲午海战败给蕞尔小国日本，极大震撼了中国知识分子，使他们深感有“亡国灭种”的可能。一时间，“保种”、“陆沉”、“启蒙”等词成了他们共同的核心词汇。林纾在自己的“救国”主题诗集《闽中新乐府》中表达了革新图强的强烈愿望：“取法西方，以变革图强；抨击陋习，以革新自强”。但对于如何图强，林纾与当时的许多传统文人一样，采取了“中体西用”的态度。具体到社会伦理层面，就是要在维护由忠、孝、恩、义等概念形成的传统伦理秩序的同时，引进西方对于“新民”和“启蒙”具有积极意义的伦理观念，并将其纳入中国伦理秩序。林纾的伦理身份也体现出“中体西用”的特征，即他是传统文化的坚定捍卫者，但同时也是维新派的一员。这两种身份，一方面使得他在中西伦理冲突中作出了不同类型的伦理选择，从而分别对原文和目的语社会产生了影响：既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原文的伦理结构和人物的斯芬克斯因子，同时也呼应和建构了目的语社会伦理禁忌和伦理秩序的破旧立新；另一方面，对立地统一在一起，表现出一定的悖论性，进而导致林纾伦理观的悖论和林译小说伦理效果的悖论。

（一）“中体”伦理身份：传统文化捍卫者

林纾的传统伦理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他将之作为根本的世界观和伦理准则。他认为对儒家伦理的坚守是朝代延续和国家立足的根本所在，伦理道德是否得到维系，决定家国的存亡：“易书诗礼及春秋之言，童子固不易知，论语一书，无所不包，可以由浅入深，何亦废之？始基已不以父母为然，又何有于国家？”（林纾，《畏庐三集》28）他还在与“五四”青年论辩时指出，清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动摇了传统伦理秩序：“剽窃西人皮毛，锄本根而灌枝叶，亡之病坐此耳”（28）。他甚至认为孔教道德可以成为全世界普世价值：“吾夫子之德既足以取信于英德法诸哲学之大家，扩而充之，似亦可暨乎全球，彼蜚蜚之微，万不生其烧天之焰，蹄涔之水亦无忧其泯夏之凶”（28）。

林纾更是在实践层面对传统伦理道德身体力行。例如，他对“孝”的践行达到了极高程度。父亲病危时，向天请求代父受难；父亲去世时，痛哭不已，以至于得了肺病；母亲重病时，侍疾四十九天，每夜四鼓起床，烧香拜佛，并沿路拜祷至越王山的天坛上，风雨无阻，乞母平安（1-3）；他甚至大力提

倡鬻臂、鬻股等现在被认为是愚孝的行为。林纾对“忠”的坚守可以说到了遗老遗少的程度。他支持维新变法运动，属改良派，主张在君主的权威和领导下推行社会政治改革。随后清王朝被推翻，皇帝退位，“忠”的对象瓦解，为表达自己对君主的忠诚和怀念，他晚年多次拜谒光绪皇帝的陵墓；1923年，已经退位多年的皇帝溥仪大婚，林纾通过陈宝琛献上自己手绘的四镜屏，陈宝琛还向溥仪讲述了林纾十谒崇陵之事，事后溥仪题写了“贞不绝俗”四字赠予林纾，林纾“犬马御恩，九顿伏地，呜咽不止”（林纾 67-68）。

因此，无论是伦理观还是伦理实践，林纾都是传统伦理的坚定捍卫者，这是他的主要伦理身份。

传统伦理捍卫者这一“中体”身份使得林纾在翻译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原文。首先，改写了原文的伦理结构。伦理结构是指以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为线索的文本结构，它有四种基本构成，即人物关系、思维活动、行为和规范（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0）。人物关系是指人物之间的关系构成；思维活动是指人物的逻辑思维过程，包括情感的产生和变化、逻辑判断、逻辑推理以及由此产生的意志，表现为意识结构和表达结构；行为是思维活动的外在表现和客观载体；规范是思维和行为所需遵循的伦理。林纾时刻提防西方伦理事实对儒家伦理系统可能造成的冲击，尽量将前者纳入后者的体系中，以中化西，因而采用了上述五种手段中的四种即替代、改写、删除和增添来实现他的“中体”伦理观，这就导致了译文呈现出的伦理结构与原文的伦理结构不完全相同。在伦理结构的四个要素中，人物关系作为小说情节发展的基础，基本上都得到了保留，例如亨利与伽茵之间的情人关系、亨利父亲与亨利之间的父子关系等，但其它三种构成均有所改变。第一，思维活动。上述《巴黎茶花女遗事》原文以第一人称自叙的表达结构描述了亚猛在与马克性爱过程中的意识结构：他狂热地爱着马克，对她的爱由此得到了升华，并产生了独占欲望。对于这一思维活动，林纾仅以一句“是夜情景甚冰冷，不可意测”一笔带过，译文的表达结构变成了第三者视角的、暗示过于模糊的一句简单叙述，意识结构被删除，而且“冰冷”一词并不能衬托出或者让读者想象出屋内二人的狂热。译文的思维活动与原文不一致。第二，行为。在《巴黎茶花女遗事》原文中，女主人公马克在母亲死时表现出的伤心程度，不如后来自己的狗死时的伤心程度，这个行为在译文中被删除了。第三，规范。林纾将原文的伦理规范改造为或纳入中国传统伦理规范，例如，对于上述《伽茵小传》亨利与临终前父亲的对话，林纾增译了“必违父训，父招不从”一句，把纲常伦理和孝道作为父子关系的规范，而这种规范在原文中是不存在的。总之，原文的伦理结构在翻译过程中被改写了，使得译文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这种改写是林纾的传统伦理捍卫者这一伦理身份使然。

其次，原文人物的斯芬克斯因子也被改写。斯芬克斯因子（Sphinx factor）是文学批评伦理学受人类学家利奇（E.R. Leach）的“人性/兽性”

(humanity/animality) 概念启发而提出的基本术语(陈红薇 15), 它是指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形成的矛盾统一体。人性因子(human factor)是指人的伦理意识, 以理性意志为表现形式, 以分辨善恶的能力为最重要特征, 它约束和控制兽性因子。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是人的动物性本能的体现, 是人在进化过程中的兽性残留, 以自然意志为表现形式。在斯芬克斯因子中, 人性因子是高级的、主导性因子, 兽性因子是低级的、从属性因子, 前者控制后者, 从而使人成为伦理的人(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74-76)。林纾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人物进行伦理改造, 导致人物在译文中呈现出不同的人性因子、兽性因子和斯芬克斯因子。以上述《伽茵小传》中亨利与临终父亲吵架一幕为例, 原文对这场吵架的描述并不一定含有道德评价, 因为在当时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伦理环境下, 子女因自己的婚恋选择与父母不一致时发生“轻微的争吵”(即原文的“some quarrel”), 大致上属于正常现象; 如果非要判出个谁是谁非的话, 也许错在父母一方, 因为他们没有尊重子女自由选择的权力。而林纾通过增添“父训”和“父招”二词将父子之间的伦理规范拔高, 提高人性因子的衡量标准, 从而降低亨利身上的人性因子, 增强其兽性因子的分量, 二者比重的变化导致斯芬克斯因子也出现变化, 亨利因此呈现出“不孝”的伦理面貌。

(二) “西用”伦理身份: 维新派

林纾与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和先进知识分子一样, 对民族的现状深感忧虑, 赞成变法和改良: “余老而弗慧, 日益顽固, 然每闻青年人论变法, 未尝不低首称善”(吴俊 18-19)。他还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交往甚密, 在后者的影响下成为维新变法的坚定拥护者。“戊戌政变”失败后, 林纾悲痛欲绝。随后, 他提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主张, 并克服自己不懂外语的劣势, 与人合译西方小说, 试图实现“译书救国”的目的。因此, 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 林纾都可以算作维新派的一员。这是他的第二种伦理身份。维新派采取改良主义路线, 主张在维持现行帝制和封建土地制度的前提下, 在各个领域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与此相一致, 林纾的伦理观自然也有革新的一面, 这表现在他赞同自由、专一的婚恋伦理, 提倡女权和女学, 呼吁适当学习西方人的贼性和冒险精神以改善国民性中的奴性和中庸之道。

第一, 自由、专一的婚恋伦理。林纾对女性在婚姻中的一些不幸事件深表同情, 赞同婚恋自由, 他感叹道: “呜呼! 婚姻自由, 仁政也, 苟从文, 女子终身无菀枯之叹矣”(林纾, “红礁画桨录·序”226)。林纾还对用情专一的一夫一妻制表达了赞赏。他将西方情爱小说模式归纳为“非两女争一男者, 则两男争一女”, 这种“三角恋”模式既反映出无论男女, 无论地位高低, 即便低贱的妓女, 都有平等追求爱情的权力, 还表明爱情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男女需彼此专一。他翻译的小说很少有滥情的情节, 他认为“男女

之爱，非专莫可。男不专女，必有一人抱幽怨而终者。女不专男，亦必无一人患难足恃者”（林纾，《畏庐漫录》42）。小说中表现出的这种专一的婚恋伦理无疑是对晚清一夫多妻封建伦理的挑战。

第二，倡女权、兴女学。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有识之士呼吁“新民”、“启蒙”，培养国民的革新意识和培育新一代国民，而新国民的培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母亲的素质，母亲以及所有女性的解放、教育和素质提升是强国保种的重要基础。在此背景下，林纾的性别伦理观开始偏向于女性，他大力提倡女权和兴办女学。一方面，他在一定程度上提倡妇女权利，反对缠足，“奉劝人间足莫缠，人间父母心如铁，听依诉苦心应折”（林纾，“红礁画桨录·序”226）。另一方面把女学与爱国伦理联系在一起，在“兴女学”一诗中写道：“母明大义念国仇，朝暮话儿怀心头。儿成便蓄报国志，四万万人同作气。女学之兴系匪轻，兴亚之事当其成。”他还认为兴女学是倡女权的基础：“故欲倡女权，必兴女学”（227）。

第三，提倡“贼性”和冒险精神。从林纾所写的译序和文章来看，他将国民的劣根性大致归为两种，即奴性和中庸。他认为埃及之所以亡国就是因为奴性太重，先后受到希腊、罗马、阿拉伯、土耳其和英国的侵略，而国民却不以国家为重，不团结一致抵御外敌，甘愿被奴。他意识到，晚清的中国与当时的埃及极其相似：面对强敌入侵，中国人“顿首俯伏，哀鸣如牛狗，既不得生，始匍匐就刑，至于凌贱蹴踏，惨无人理，亦甘受之”（林纾，“《鬼山狼侠传》叙”102）。他还痛恨晚清社会和官场盛行的庸俗的中庸之道，这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使得社会缺少前进的动力，无法与列强抗衡。

这种“西用”的伦理身份和伦理观使得林纾在翻译过程中选择保留原文中符合他“维新”诉求的伦理事实，因而呼应并推动了晚清社会当时即将松动的伦理禁忌和伦理秩序。伦理禁忌是人类力图对自身兽性即原始欲望加以控制而形成的伦理规范（如乱伦禁忌）。它被制度化之后即形成伦理秩序，是伦理秩序形成的基础和运行的保障（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1）。伦理禁忌的松动、加强或改变，会导致伦理秩序的变化。林译小说对晚清社会伦理禁忌和伦理秩序的呼应和建构以以下三个方面（与上述“西用”伦理身份下的三个伦理观相一致）为例进行说明。

第一，家庭和婚恋方面。在中国封建社会，“父为子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家庭和婚恋的伦理规范；反之，违背父母之命则在一定程度上是伦理禁忌（“不孝”）。在晚清内忧外患、“穷则思变”的语境下，伦理规范的约束力不断减弱，伦理禁忌逐渐稀释，伦理秩序处于破旧立新的过渡期。在《伽茵小传》中，亨利违背父亲临终嘱托，不肯与爱玛结婚，而要迎娶伽茵，并因此与父亲吵架；伽茵也公然指责父亲遗弃了她。林纾暗示和批评这两个人违背了“孝道”，但仍然保留了这一事实，并完整译出二者不顾名利地位和道德约束而追求纯洁爱情的过程。这种以及类似的伦理选择反而使得林译

小说风靡一时，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表现之一就是许多读者都同情伽茵的命运和境遇，郭沫若（117）就表示：“我最初读的是 Haggard 的《伽茵小传》。那女主人公的伽茵是怎样的引起了我的深厚的同情，诱出了我无限的眼泪！我很爱怜她，我也很羡慕她的爱人亨利。”鲁迅、冰心等青年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林纾译文的影响而逐渐走上新文化运动之路。这说明父母之命、父为子纲的传统伦理已开始逐渐让位于纯真爱情之伦理：只要相爱男女追求的是纯真爱情，无论违背什么伦理，都是值得赞颂的。“不孝”这一伦理禁忌开始松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开始摆脱“纲常”的束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恋伦理开始朝着自由恋爱的方向发展，因此家庭和婚恋方面的伦理秩序开始重新构建。

第二，性别伦理方面。中国封建社会一直以“女子无才便是德”作为对女性的禁锢，女子若上学接受了教育，就可能变得“聪明”和“叛逆”，因此女学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禁忌的特征。林纾保留甚至夸大符合他女权和女学思想的词语或情节。例如，《伽茵小传》原文的开场部分在描述伽茵的性格时，使用“enjoyed a certain measure of education”（受过一点教育）这一短语，而林纾、魏易（6）将它译为“美文而通，复涉猎文史”，很显然属于过度翻译（over-translation），夸大了伽茵的受教育水平。不仅此处如此，在林纾的翻译过程中，凡是涉及伽茵“学问”的描述均被保留且被夸大翻译（潘红 400）。事实上，伽茵的受教育水平远非林译描述的那么高。原文第一章有过交代：她在学校读书年头不多，且表现非常平庸，毕业后连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都难以得到。林纾选择保留且夸大她的教育水平，是在挑战“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和伦理禁锢，鼓励女性走出闺房接受教育，从而培育“国民之母”，最终改善国民素质。五四前后，女性开始大量进入新式学堂接受教育，还成立了许多专门的女子学校，女权和女学面貌焕然一新。这不一定是林译小说建构的结果，但林译小说至少顺应了这一潮流，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性别伦理秩序的变化。

第三，国民性格伦理方面。将冒险精神和贼性从伦理禁忌的地位提升到积极的伦理规范的地位，将中庸和奴性降低至伦理禁忌的地位。一方面，林纾通过保留外国小说中的冒险意识来“医治”国民的中庸这一劣根性。他先后翻译了《鲁宾逊漂流记》、《雾中人》等多部探险小说，书中的主人公在非洲探险过程中，为了得到宝藏和财宝，九死一生，百折不挠，表现出强烈的拼搏精神，而这种拼搏精神正是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国人所需要具备的品质。另一方面，他还通过保留《黑奴吁天录》等小说原文中人物利用基督教某些教义反对和质疑奴隶制的言行，并删除基督教中劝人忍让、纵容侵略、接受奴役的说辞，来鼓励国民奋起反抗列强的侵略，拒绝被奴役。冒险精神和贼性地位提升，中庸和奴性地位下降，在这一升一降之间，国民性格伦理秩序发生了变化，朝着积极进取的方向迈进。

（三）悖论

“中体西用”伦理身份本身就蕴含着悖论：在同一个框架内，“体”（传统伦理维护者）的因素与“用”（维新派）的因素本应该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动态关系，前者的过度发展可能会威胁到后者的地位，并可能最终取代后者，但在体用模式下，二者的相对地位已经预先设定了，“用”不能超过“体”，只能在“体”允许的范围内运作。林译小说中，中国传统伦理秩序需要引进新的异质因素以实现自身变革，但同时又对这种异质伦理保持警惕，将它控制在可控范围内。伦理身份的这种悖论导致他伦理观的悖论和林译小说社会效果的悖论。

1. 伦理观的悖论

林纾伦理观的悖论性主要表现在：他既期待男女婚姻自由，却又将婚姻纳入传统的“礼”的体系内；倡导女学和女权，而其目的却是为了让女性更好地遵守传统伦理道德；希望国人适当地学习西方人的贼性，却又对之保持警惕。

第一，他所赞同的婚姻自由需符合“礼”的规范。在爱情小说的翻译中，他以“礼”主导男女之间的关系，使爱情场景呈现出“礼”的氛围。例如，他将伽茵和亨利之间的热烈拥吻翻译成“伸手为礼”。这源于他的婚恋伦理观：“婚姻自由，仁政也。苟从之，女子终身无菀枯之叹矣。要当律之以礼”（林纾，“红礁画桨录·序”227）。寒光也认为林纾太注重“礼”：“他太守着旧礼教，把礼字看得很重，不但他自己的言论和作品，就是翻译中有稍微越出范围的，他也动言‘礼防’，几于无书不然！”（寒光99）

第二，虽然林纾兴女学的最终目的是强国保种，但直接目的却是让女性更加懂得礼节、更好地坚守道德伦理。他的逻辑可能是：女性有了才智和学问，才能对自己的言行作出符合道德标准的理性选择和更好地遵守伦理秩序，进而教导出遵守伦理道德的子女，达到新民和启蒙的目的。他认为女子有才学，其好处是：在感情上“深于情而格于礼，爱而弗乱，情极势逼，至强死自明”；在为人处事上“必能核计终身之利害，知苟且之事，无利于己，唾而不为”。女子若无才学，坏处是：“惟无学而遽撤其防，无论中西，均将越礼而失节。”他还举例说明：“人爱其类，男女均也。以积学之女，日居仓荒中，见一通敏练达者，直同日星鸾凤之照眼，恶能弗爱？爱而至死，而终不乱，谓非以礼自律耶？”（林纾，“红礁画桨录·序”226）

第三，林纾尽管保留了原著中具有冒险精神和贼性的情节和言行，但他对西方基督教新教伦理中具有侵略倾向的“贼性”、“盗性”等始终怀有戒备之心。他在译序中明确提醒读者：“敬告读吾书者之青年挚爱学生，当知畏庐居士之翻此书，非羨黎恩那之得超瑛尼，正欲吾中国严防行劫及灭种者之盗也”（林纾，“雾中人·叙”233）。他还指出了西强中弱的根本原因和中国作为被侵略者的应对之策：“吾华开化早，人人咸以文胜，流极所至，

往往出于荏弱。泰西自希腊、罗马后，英、法二国均蛮野，尚杀戮。……究之脑门人，躬被文化而又尚武，遂轶出撒克逊不列颠之上，今日区区三岛凌驾全球者，非此杂种人耶？故究武而暴，则当范之以文；好文而衰，则又振之以武”（林纾，“剑底鸳鸯·序”250）。

2. 伦理效果的悖论

林译小说在社会上引起的伦理效果存在悖论，既有共时的，也有历时的。

首先，共时悖论。早期的林译小说在出版后不久即风靡全国，轰动一时，对于书中伦理观，有进步倾向的人士一般给予正面评价，个别极保守人士给予负面评价。如本文第二部分的第一段所述，郭沫若（117）同情伽茵，喜欢亨利，钱钟书（钱钟书等 23-24）也反复阅读林译小说，进而对西洋文学产生了兴趣；而寅半生则怒斥其所传达的伦理道德为“淫”、“贱”和“无耻”（陈平原、夏晓虹 249）。这种矛盾的评价源于当时伦理环境本身的矛盾性：中国传统伦理禁忌在保守人士中仍是主流和本位，而新伦理观开始萌芽，得到进步人士尤其是进步青年的拥护。

其次，历时悖论。林译小说在具有进步倾向人群中的伦理效果经历了先誉后毁的过程，其中的分界线是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萌发之前，林译小说好评如潮，因为其中传达的西方伦理事实和伦理观迎合了当时中国社会变革求新的需求，具有很大的启蒙价值。新文化运动开始萌发后，林译小说逐渐被读者抛弃。梁启超的评价颇具代表性，他在1920年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林纾……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於新思想无与焉。”事实上，如本文第二部分的第（二）节所述，林译小说中是有一些新思想的，如自由的婚恋伦理、倡女权兴女学、提倡“贼性”和冒险精神等，但是，随着革新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对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的反对和鞭笞也愈加激烈，新文化运动极力批判替圣贤立言的卫道文字，甚至试图彻底打倒旧礼教，提倡全盘西化，“中体西用”已经被打破。以传统伦理捍卫者为“中体”身份的林纾及其所译小说自然就“被动地”站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遭到了猛烈攻击。同一部林译小说在同一个人群中的评价前后不一，经历了先誉后毁的过程，其原因是社会伦理禁忌、伦理秩序和伦理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伦理秩序不断瓦解，其主体地位不断削弱，而新的伦理观念逐渐得到认可，地位得以提升，伦理观的“中体西用”模式逐渐瓦解，“中”与“西”的地位差逐渐被抹平甚至反转。

三、结论

本文借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相关理论和术语，考察了林纾小说翻译过程中的伦理选择和译者伦理身份，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翻译具有一定的伦理建构性。翻译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忠实传达原文信息，尤其当原文中的伦理事实与目的语社会伦理观产生激烈冲突，或

者译者抱有特定伦理诉求时，对原文的改写就在所难免。译者可以选择完全屈从于目的语社会的伦理禁忌，将原文的伦理系统最大程度上“归化”到目的语伦理系统中，让读者感觉不到“异样”，从而重新建构原文的伦理结构；也可以出于自己独特的伦理诉求，采取“异化”策略，保留原文的“异样”伦理事实，引入其中蕴含的伦理观，进而建构宏观层面的伦理秩序和伦理环境。这种建构性是通过文学的基本功能即教诲功能（王松林 47）实现的：读者对译文进行审美性阅读进而获得道德教诲（陈后亮 41），头脑中的伦理观念得以重构，社会伦理也因此得以破旧立新。

第二，翻译过程中的伦理选择既取决于译者伦理身份，又能建构译者伦理身份。林纾对原文伦理事实既有改写也有保留，这种伦理选择取决于他传统伦理捍卫者和维新派合为一体的“中体西用”伦理身份。这种身份本身蕴涵的悖论，导致他伦理观的悖论性和林译小说伦理效果的悖论性。这两种悖论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伦理选择对于伦理身份的建构性：伦理选择上的既改写也保留使得林译小说呈现出中西伦理杂合的面貌，从而建构了林纾的“中体西用”伦理身份，但这种身份既不能让保守派满意也不可能让改良派中的激进派满意，而这种通过所译小说建构出来的身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当社会历史朝着更加革新的方向前进时，林纾就被五四青年们斥为固守传统伦理的遗老遗少。

第三，文学翻译的伦理学批评还有待加强。本文尝试将文学伦理学批评用于翻译研究，得到了有益的发现：翻译可能会改写原文的伦理结构和人物的斯芬克斯因子，还可能呼应和建构目的语社会的伦理禁忌和伦理秩序。同时，也发现文学翻译研究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相关理论和术语，需做相应调整，如本文第一部分的第一段所述，翻译过程中的伦理选择和伦理身份与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伦理选择和伦理身份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前者主要存在于文本跨语际转换过程中，而后者主要存在于单语种文本（至少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般不涉及跨语际转换。这就表明，文学伦理学批评是文学翻译研究的一个有用的视角，但还需进一步思考二者结合的具体方式，还需要大量的案例研究来充实和完善这一研究路径。

Works Cited

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

[Booth, Wayne Clayson.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Trans. Hua Ming, et al. Beijing: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2017.]

陈红薇：“文学伦理学批评：基于中西文化的文学批评理论创新”，《文学跨学科研究》1（2021）：14-21。

[Chen, Hongwei.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Critical Theoret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1 (2021) : 14-21.]

- 陈后亮：“搭建文学批评与社会现实的桥梁：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文学跨学科研究》1（2021）：38-45。
- [Chen, Houliang.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Social Reality: The Value Choice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1（2021）：38-45.]
- 陈礼珍：“复兴与创新：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过去、现状与未来”，《文学跨学科研究》3（2019）：389-414。
- [Chen, Lizhen. “Rejuvenation and Innovatio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3（2019）：389-414.]
- 陈平原 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 [Chen, Pingyuan and Xia Xiaohong, eds. *Materials for Theories of 20th-Century Chinese Novels*. Beijing: Peking UP, 1997.]
- Dumas, A. *La Dame aux Camelias*. Trans. David Coward. Oxford: Oxford UP, 1986.
- 郭沫若：《郭沫若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
- [Guo, Moruo. *Selected Works of Guo Moruo*.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ress, 1979.]
- Haggard, H.R. *Joan Haste*.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5.
- 哈葛德：《伽茵小传》，林纾 魏易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 [Haggard, H.R. *Joan Haste*. Trans. Lin Shu and Wei Y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1.]
- 寒光：《林琴南》。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
- [Han, Guang. *Lin Qinnan*.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35.]
-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 [Liang, Qichao. *A Survey of Scholarly Research in Qing Dynasty*.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1.]
- 林纾：《畏庐漫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
- [Lin, Shu. “Lan Yun”. *Short Novels by Wei Lu*.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5.]
- ：《畏庐三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
- [—, “A Narrative of My Risks”. *The Third Book of Wei Lu*.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7.]
- ：“红礁画桨录·序”，《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剧研究卷》阿英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26-27。
- [—, “Preface to *Beatrice*.” *Literature Materials in Late Qing Dynasty (Volume of Novels and Operas)*. Ed. A Yi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0. 226-27.]
- ：“剑底鸳鸯·序”，《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剧研究卷》阿英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50-51。
- [—, “Preface to *The Betrothed*.” *Literature Materials in Late Qing Dynasty (Volume of Novels and Operas)*. Ed. A Yi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0. 250-51.]
- ：“雾中人·叙”，《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剧研究卷》阿英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32-33。
- [—, “Preface to *People of the Mist*.” *Literature Materials in Late Qing Dynasty (Volume of Novels and*

- Operas*). Ed. A Yi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0. 232-233 .]
- : “《鬼山狼侠传》叙”，载吴俊编：《林琴南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101-102。
- [—: “Preface to *Nada the Lily*.” *Essays by Lin Qinnan*. Ed. Wu Jun. Hang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f Zhejiang, 1999. 101-102.]
- 马晓俐 郝祥建：“《绿茶》中的伦理身份与死亡冲动”，《世界文学研究论坛》3（2019）：499-508。
- [Ma, Xiaoli and Hao Xiangjian. “Ethical Identities and Death Impulsion in Green Tea.”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2019）：499-508.]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10（2020）：71-92。
- : “Value Choice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0（2020）：71-92.]
- 潘红：《哈格德小说在晚清：话语意义与西方认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年。
- [Pan, Hong. *Haggard’s Novels in Late Qing Dynasty: Discursive Meaning and Recognition of the West*.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9.]
- 钱玄同：“通信”，《新青年》1（1917）：17-18。
- [Qian, Xuantong. “Correspondence.” *New youth* 1(1917):17-18.]
- 钱钟书等：《林纾的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年。
- [Qian, Zhongshu, et al. *Lin Shu’s Translatio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1.]
- 查尔斯·罗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聂珍钊访谈录”，《世界文学研究论坛》1（2015）：7-14。
- [Ross, Charles. “A Conceptual Map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erview with Nie Zhenzhao.”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1（2015）：7-14.]
- 尚必武：“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伦理意识与伦理行动”，《文学跨学科研究》1（2021）：22-30。
- [Shang, Biwu.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Ethical Consciousness, and Ethical Actio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1（2021）：22-30.]
- 王松林：“‘为诗一辩’：论文学的伦理教诲功能”，《文学跨学科研究》1（2021）：46-55。
- [Wang, Songlin. “‘The Defence of Poesy’: On the Ethical Teaching Function of Literatur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1（2021）：46-55.]
- 吴俊：《林琴南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
- [Wu, Jun, Ed. *Essays by Lin Qinnan*. Hangzho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f Zhejiang, 1999.]
- 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林纾、王寿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年。
- Dumas, A. fils. *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 Trans. Lin Shu and Wang Shoucha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896.]